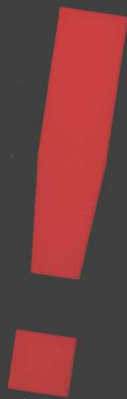


川島芳子生死之謎
解密



李刚 何景方◎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川島芳子生死之謎

解密



李刚 何景方◎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川岛芳子生死之谜解密/李刚,何景方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472-0203-6

I. ①川… II. ①李…②何…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73106号

CHUANDAOFANGZISHENGSIZHIMIJIEMI

川岛芳子生死之谜解密

李刚 何景方 著

出版人/徐 潜

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www.jlws.com.cn

责任编辑/高志胜

装帧设计/李岩冰 张 洋

发行/吉林文史出版社

印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320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9.5

书号/ISBN 978-7-5472-0203-6

定价/36.00元

序言篇



爱新觉罗·德崇（溥昱）用满汉两种文字为本书题：发潜阐幽，不避子卯。

爱新觉罗·德崇（溥昱）

爱新觉罗·德崇（溥昱）1945年出生于河北承德，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一世孙。198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事院校，现任辽宁满族经济文化发展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受家庭传统熏陶，对满汉文字书法、汉语言文学情有独钟。其满汉合璧的书法作品在国内外民族书画展上屡屡获奖。四种满文书法体2006年获得国家版权局认定的《爱新觉罗·德崇满文字范》终身著作权资格。其文学作品代表作《悼溥杰先生》、《岳飞是千古忠臣、民族英雄》在国内外专家学者中都受到好评。

2003年被录入《当代满族名人录》，2006年被录入《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

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满族和各民族的团结、和谐、共同进步的事业，他至今仍不知疲倦地奔波着……

爱新觉罗·兆基题



川島芳子生死之謎
新証



爱新觉罗·兆基为本书题字：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

爱新觉罗·兆基

爱新觉罗·兆基，1935年12月14日出生，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三世孙。毕业于天津工农师范学校，现为中国承德避暑山庄保护协会理事、中国著名满族书法家。

自幼受家庭教育及家族的影响，受益于先辈溥杰、溥佐、溥铨的指教，善工行书，喜好董其昌、赵孟頫书体。

1995、1997年两届世界满族书画大会，其作品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并收入画册。1999年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之邀，参与为《清代皇帝宝玺总谱》书写宝玺印名。

疑案六十载 揭秘在长春

王庆祥

《川岛芳子生死之谜解密》是一本以事实考证为基础的史学研究著作，有资讯价值、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回想一年前，应两位作者之约，我为他们所撰的《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作序，开篇也阐明了这一观点。时隔一年，作者又推出新著《川岛芳子生死之谜解密》，不能不让我感到惊讶和高兴。惊讶的是，他们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在前书基础上重新谋篇布局，摈弃了前书中尚无确证的关于川岛芳子生平经历内容，而又向读者全面、系统地展示了近一年来川岛芳子生死考证的新思路、新证据和新成果。令我高兴的是，在现阶段史实考证领域“课题难定、资料难找、证据难寻、结论难下”的情况下，两位作者以“川岛芳子生死之谜”这一世纪悬案为课题，以实考论，查疑解惑，分段突破，为历史疑案的破解和学术研究开出一块新天地，其意义是多方面的，我向两位作者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

本书所展现的艰难考证历程、丰富翔实的证据和严谨缜密的解析，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川岛芳子生死之谜”的真相。

62年前的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金璧辉）被国民政府北平当局以汉奸罪执行了“死刑”。然而，被“枪决”的“川岛芳子”是“正身”？还是“替身”？这在当年就众说纷纭，疑雾重重。世人哪里知道，川岛芳子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之后似乎“消失”了，实际又神秘“复活”。她隐姓埋名，藏匿民间，痴心佛道，又如此这般“离奇”或“传奇”地生活了30年。本书完整地记述了这一历史真相揭秘的全过程，从而使川岛芳子这30年余生给我们的史实研究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也唤起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或可为中国近代史上这桩争议了半个多世纪的悬案划上句号。

应该特别提及的是，我与本书两位作者，也是考证人，过去并不相识。因为我是搞清朝末帝溥仪研究的，对同为爱新觉罗皇族的川岛芳子的历史也有所涉猎。2008年初，他们为了考证需要找到我，说是“慕名而来”，请我当顾问、出主意，我起初对此考证也抱怀疑态度，但被他们的诚意所感动，欣然应允，参与了进来。继而从两位考证人那里看到大量证言、物证和有

关川岛芳子的历史资料，逐渐认可了他们认真、严谨的考证。他们运用提取证据的工作规则，参考众多相关历史资料，有理有据地把一位自1948年底至1978年初生活在长春市郊新立城齐家村的“方老太太”呈现在我面前。从她的相貌到行为举止以及她留世的遗物，通过鉴定和分析，这位“方老太太”就是川岛芳子，具有可靠性和排他性。正是这种让我没有理由不信的情况，使我不但成为两位考证人的顾问，还一发而不可收地亲身参与了以后的考证工作。

在我的参与下，2008年6月28日，两位作者把川岛芳子生死之谜的最新考证成果，带到了第二届（天津）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引起了与会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一世孙爱新觉罗·德崇先生的共鸣。

德崇曾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某年的冬天，在沈阳家中见过来访的川岛芳子，当时他年龄较小，对此还没有特别的关注与思考，更没有想过是否应该公开这个家族的“秘密”。如今有了长春的考证成果，两者“证据互证”，也让本书两位作者的考证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2008年11月初，应我之邀，清太祖十三世孙、满族著名书法家爱新觉罗·兆基先生专程来长参加长春溥仪研究会的一个笔会。在新闻媒体参与下，由兆基先生引发了同为爱新觉罗皇族的川岛芳子生死之谜的敏感话题。也是由于我的推介，《新文化报》连续十余期报道了川岛芳子生死考证的最新成果，引起社会的关注，甚至是轰动。长春电视台《城市速递》则根据我的意见开辟了川岛芳子生死谜团报道专栏。一时间也惊动了中外媒体，特别是日本媒体。日本时事通讯社在第一时间及时报道，日本朝日电视台还邀请我、两位作者、当事人张钰及其母亲，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和证物检测，并拍摄了电视专题片。

2009年1月，我与作者之一何景方先生前往浙江国清寺做第二次考察，不但从老僧人那里获得“方居士”（川岛芳子）及其保护负责人“广幸”（秀竹）的线索，而且还意外发现了“方觉香居士”的骨灰，使川岛芳子生死之谜的考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使考证成果更为丰富。总之，我在参与考证近一年的时间里，虽然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却是非常值得的。

在接触中我也了解到，本书的两位作者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完全是“门外汉”，充其量是历史研究“爱好者”。然而，偶然间邂逅了这个历史课题，他们便抓住不放，这足以显示出他们对历史研究的钟爱和过人的胆识，以及“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非凡气魄，这正是所谓“人生的机遇在于无悔地坚持”。

他们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能把一桩中日两国都关注且争议了60年之久的历史疑案，用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证和物证，串联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了1948年3月25日从北平监狱逃生的川岛芳子在长春新立城又经历了从“方老太太——方居士”之一幕30年戏剧的真实存在，实在令人敬佩。我认为，这也得力于他们的学识、阅历和过去所从事的工作。作者李刚先生在省直

机关长期从事政法工作，养成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严谨做事风格，所以对考证的结果把握得比较准确。何景方先生曾在长春市直机关做过多年人事考核工作，在取证问题上考虑得比较细致，经考证的事实令人信服。总之，两位作者除具备一定的天赋外，最重要的还是他们锲而不舍的追求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才得以收到“踏破铁鞋无觅处，苦尽甘来事成真”的效果。

此外，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和支持也不可忽视。正如作者坦言，取得考证成果是“专家的指导、社会的协助、方方面面的支持，其中也包括日本朋友的参与和帮助”，这正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在《川岛芳子生死之谜新证》出版一年后而新版书即将问世的今天，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甚至有人说作者是在“作假”和“炒作”。我认为，一个新的学术观点的产生，能有不同的说法与之相辩，这本是好事，也是求之不得的争鸣现象。因为对任何新观点而言，在已经形成定论的观点面前，是要经过一番检验和洗礼的。真金经过火炼，宝玉经过打磨，真东西才能被社会和历史所接纳。本书就是在前书基础上，充实以近一年来的新证，使考证更趋圆满。当然，事情是没有十全十美的，包括本书内容，难免还会存在瑕疵，但瑕不掩瑜。我认为，本书只要是能证明：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没有死在北平监狱，被执行“枪决”的“川岛芳子”是一个“替身”；1948年底至1978年初，生活在长春新立城齐家村的“方老太太”，就是从北平监狱逃生的川岛芳子，这就已经达到了目的。

2009年12月28日改定

◎王庆祥：196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现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春市政协常委兼文史委副主任、长春溥仪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溥仪研究专家。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石玉新

关于“川岛芳子生死之谜”这个话题，我在二十六七年前就有所接触。

1982年夏，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做编辑工作。两三年后，为补充人手不足，更为严格审稿把关，我会聘请了三四位老文化人帮助工作，其中一位宋乃吉先生尤为突出。我对宋先生执学生礼，关系十分融洽。文史资料征集对象中，相当部分是社会各界阅历丰富的老人。我想，宋先生解放前留过洋，办过报，走南闯北，解放后在省政府工作多年，历经坎坷；人又机敏健谈，博学强记，肯定有不少“三亲”的东西值得一写，咱干吗舍近求远呢？

宋先生答应了我的征稿请求，用“迪中”笔名陆续写了两篇，《战时日本见闻录》和《川岛芳子伏法目击记》，内容丰富，忆述翔实，文笔也很好。两篇史料文章都发表在《河北文史资料选辑》上，就是现在我任主编的《文史精华》月刊的前身。

在《川岛芳子伏法目击记》中，宋先生写道：

我当时在北平一家报社担任采访记者。就在川岛芳子——金璧辉被执行枪决的头一天夜晚，报社接到通知，说有关当局已决定于次晨，在第二监狱（实则在第一监狱）处决川岛芳子。报社接到通知，马上派人到家把我叫起来，说明此事。当时虽在深夜，听到此讯，唯恐错过时机，马上骑着自行车，加快速度驶往德胜门外第二监狱。

……

赶到南城外第一监狱时，天还没亮，但从远处便已模糊看到监狱门前有一团黑影在蠕动。骑到跟前，才看清约有二三十人，也都是各报社同行。问过情况，才知道川岛芳子死刑是在这里执行。心想虽累出了一身汗，总算没白跑。但为什么都在大门外待着不进去，莫名其妙。问过后才知道狱里人传言，奉上司命令，在执行前不准任何人进入，恐影响治安。因此，狱门紧闭，大家只好在外面等候。

过了一段时间，忽然有人从门缝中看到，狱里场地上好像有带着照相机的外国记者。情况一经传出，门外的中国记者顿时骚动起来，抢着去看究竟。不看则已，看过后愤怒之情勃然而生，于是，不约而同地砸起监狱大门来，并高喊着：“开门！开门！”“为什么让外国记者

进去，不让中国记者进去？”“你们都是洋奴吗？岂有此理！”……但尽管砸门叫喊，大门仍是紧闭着，无人应声。门外的人气就更大了，深更半夜，冒着冷风起来，就是为了采访这一现场见闻，结果竟遭如此冷遇，从何说起！砸门和喊叫声接连不断。这时，有几个高人一截的记者，却一声不响，抢拍下这个难得的镜头——一群记者在监狱门外砸门叫喊的特写！

不久天已大亮了，只听里面枪声响了。约莫又过了一个多小时，监狱大门突然打开了，记者们蜂拥而入，只见几个人抬出一块木板，上边放着刚执行过的川岛芳子——金璧辉的尸体，摆在空场上。这时的川岛芳子，已是头发蓬乱，满脸血污，面目全非，辨不出模样。

川岛芳子枪决在监狱秘密执行，已给人以疑点，加上行刑前和行刑时，只让外国记者而不让本国记者采访，违背了事先约定的诺言，更属荒唐少见！这还有什么可写的呢？就顺从地给国民党统治者充当御用工具，为他们歌功颂德吗？不能！这是当时这些中国记者共同的心声。

“里面有鬼！”“这不是川岛芳子，是偷梁换柱！”“为什么行刑不让记者看？”……乱哄哄地响起记者们的喊叫声。有人就提出，回去就这样写，明天报上见。“好！”大家一致表示赞同。

第二天的大小报纸，在头版上果然都刊载出“女间谍川岛芳子昨已伏法，在第一监狱秘密执行枪决，弹穿头部，面目全非，真假难辨……”等等大小标题和记者采访被拒之门外的详细情形。有的报纸附上了一群记者在监狱门外砸门叫喊的照片，作为见证。这实际上，就是泄吃闭门羹之愤，也借以表示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

在当时，如果仅只一家报纸登载这样耸人听闻的新闻，是会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打击和追究责任的，各家报纸都这样做，就使他们无从下手，落个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这就是这件带有神秘色彩的新闻出世的真实情况。如果读者有兴趣的话，不妨查阅一下当时北平的一些报纸，可以找到以上所说的川岛芳子——金璧辉执行枪决的报道和照片。

有关川岛芳子生死之谜的东西，我以前也听到看到一些，大都离奇甚至荒诞，也就听听看看而已，过耳不过脑，入目不入心。宋先生的亲历文章，是我第一次严肃认真地“零距离”地接触这个话题。我认为宋文真实可靠，当为信史，印象非常深刻。

没想到二十多年后，这件“谜案”又一次摆在我的眼前。2008年暮春时节，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邀请我北行，参加有关“川岛芳子生死之谜”论证会。注意，不是座谈会，不是研讨会，也不是征稿汇稿会，而是“论证”，这两个字是很有分量的，属于学术会议的重量级。对方已经准备了“证”，请你去“论”，不管是赞成还是否定，你要拿出你的“证”去审视、评断他的“证”，“论”不好就让人家给“证”了。这活儿好干吗？

但我还是欣然前往，复印了一份宋先生的文章，也不知算不算我的“证”。我的出发点，六分在好奇，三分在学习，剩下一分才是证实论理。可见底气严重不足。水平不高态度好，所以我

开会很认真，很投入，全神贯注地听记东道主和各路豪英的讲话，自己发言时也放低调门，采取商量的口气，不像往常与会一副真理在手、史实在胸的样子。

我好奇在这么一个所谓六十多年未解的、实际上早有定论或公论的“谜案”，能被长春人大张旗鼓地、甚至是义无反顾地张扬，必定有七八成把握，否则他不敢出手。要知道全中国搞这段历史的专家多了去了，川岛芳子是个大热点，长春人不会胆大到不管不顾的地步吧？“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我要领教他掌握了什么利器。说明一点，好奇不是猎奇，这句话适用于我；通过会议了解，也适用于研究这个“谜案”的诸君。

应邀与会的辽宁赵杰、天津方兆麟、内蒙黎丽、吉林姜东平等，都是我们这一行的精英翘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大鳄级的人物，更何况还有我十分尊崇的王庆祥老师。会上我确实开阔了眼界，学习了不少东西，特别是王庆祥先生在发言中的一句话，让我切实领略了大家风采，受益匪浅。这句话我留在下文讲。

记得我在发言中讲了三点意见，或者说是体会。我把它扒梳整理一下，拿到这里作为这篇序文的观点。

首先我向李刚、何景方两位先生表示敬意，由衷的敬意。历史研究不比文学创作，有那么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其每一步，都受制于客观，受制于寻觅线索、调查事因、走访当事人和知情者、翻阅图书档案资料、千里迢迢甚至不远万里去现场观察体验，等等等等。而后还要对上述历尽艰辛得到的原始材料进行分析、选择、鉴别、整理、研究、归纳；又一一串接等等等等。要知道是每一步，也就是每个环节都要这样不厌其烦地、丝毫不能马虎地去进行；那整个“谜案”要走多少步、经过多少环节，才能搞清楚——很可能还搞不清楚！其心血的倾注，时间的占用，精力的投入，体力的消耗，财力的花费，都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用使命感、责任心等常用词来说明二位先生的精神和行为，当然准确，但流于俗套。我认为首先是兴趣，性格决定命运，心态决定生活，兴趣决定事业。我和两位先生接触还少，但我敢肯定他们都具备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性格，具备无论逆顺、穷富、困达都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具有执著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人认为苦不堪言而他们却乐在其中的兴趣；是立志，也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男子汉。

其次，抓住“川岛芳子生死之谜”这个命题，即便站在科学的立场，也是需要一点精神、一点儿勇气的。所谓科学，就是客观事实以及由此给我们提供的思维延展和研究空间。我在前文引述的宋乃吉先生的回忆文章，表明这个“谜案”并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这时的川岛芳子，已是头发蓬乱，满脸血污，面目全非，辨不出模样”，这是亲历者当时的记载。现在揭示的有关“方老太太”即川岛芳子的一切证物证词，听起来确实有些离奇，离奇就是不平常，出人意料，历史上离奇的事情还少吗？一个偶然我们可以说是偶然，两三个偶然也可以说是巧合，

那么十个、二十个偶然呢？那就要正视，要坐下来研究一番，看看里面有没有必然。我赞成傅斯年先生的治学方法，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有三分史料说三分话，其基点是川岛芳子当年到底死没死，只要能证明她没死，那么以后任何可能的事情都会出现，任何“离奇”都可能发生。那种轻易否定研究这个“谜案”的做法，我认为不足取的。

现在搞文史研究，找资料、找证据非常困难，长春发掘了这样一个重大题材，而且掌握了许多资料证据，很不容易，应当抓住，搞出成果。胡适先生说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我们不是在“炒”，不是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是以事实为根据，以科学为准绳，以存真求实为目的。换言之，有此初衷和行为准则，就是“炒”，就是“取宠”，就是“作惊人之笔”，又何碍何妨？通过我们严谨细致、实事求是的考证研究，还原历史，去伪存真，让广大民众了解真相，为祖国史学做出贡献，何责而来？何过之有？

史学界有句名言，就是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不能用历史分期的“当代”概念来诠释这句话，文革十年也属于当代范畴，在那种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中，能提出并研究“川岛芳子生死之谜”吗？“当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更多的是一个思想概念，是对历史做出叙述时所出现的一种思考状态。研究“谜案”，我们得益于当今宽松和谐的社会生态，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认知水平的提高。“希特勒生死之谜”都可以研究，况川岛芳子乎？亲手杀害我无辜百姓的侵华日军都可以改造成日中友好人士，川岛芳子就不能成为隐匿从善的“方老太太”吗？当然，这都是“大胆假设”，更重要的是“小心求证”，小心再小心。最后，要引用王庆祥老师的一句话了——“为弄清历史真相，应该大胆考证，即使结果是假的，方老太太不是川岛芳子，也要进行下去。”这就是说，考证的目的是弄清历史真相，方老太太是或者不是川岛芳子，都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我不虚此行。

李刚与何景方先生约我写一篇序，便拉拉杂杂地码了上述一堆字。是不是序大家凑合着看，反正我觉得不像。

2010年1月12日于石家庄

◎石玉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共河北省委研究室特邀研究员、河北省文史资料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精华》编辑部编审、《文史精华》月刊主编。

我参与研究川岛芳子的过程

日本学者 野崎晃市

2008年11月3、4、5日三天的早上，我在长春的家中，从订阅的《新文化报》上连续看到了关于“方娉就是川岛芳子”的报道，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我是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毕业，然后在日本筑波大学念博士，研究近代史，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与日本有着直接关系的中国近现代史，及与中日两国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川岛芳子这个历史人物都喜欢研究。如今，《新文化报》报道了川岛芳子1948年3月25日没有死于北平监狱，又在长春附近存活了30年的新闻，怎能不让我这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动心呢？更何况，《新文化报》还披露了川岛芳子留世的一幅表现日本女人洗浴的画，更引起了我的怀疑。因为根据《新文化报》对画的详细介绍，使我记起了在日本历史博物馆看过的一幅日本画，而且，我从网络上还搜索到了这幅画的图像。据此，我就怀疑，《新文化报》关于川岛芳子“未死说”的报道极有可能是假新闻。有了这个想法后，一种求真求实的职业敏感，促使我非要把此事辨个真假不可，也想看看《新文化报》的报道是否存在漏洞。于是，11月5日这一天，我就让妻子王健给《新文化报》新闻热线打了一个质疑电话。接线员很快就通知了负责这篇新闻报道的记者刘昕先生。刘记者得到信息后，当天就给我回了电话。当他听了我对川岛芳子“未死说”及日本风情画的看法后，感到我谈的观点有道理，当即与我约定，第二天就与考证人见面。

12月6日下午，我任教的长春大学没有我的课，我和妻子就应《新文化报》刘记者之约，来到了位于人民大街2836号考证人李刚的办公室所在地。坐落在长春市中心人民广场附近的2836号二层环楼，原来就是伪满“协和会”的旧址，如今是长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触景生情，我好像有一种预感，川岛芳子“未死说”这件事情和伪满时代的历史似乎有着某种莫名其妙的联系。因为我了解，日本大特务、“满映”（长影前身）理事长甘粕正彦就曾是“协和会”的总务兼规划部长，而且与川岛芳子关系密切。

在此二楼的233房间，我第一次见到了素昧平生的考证人李刚、何景方及顾问、中国溥仪研究专家、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老师。

在与考证人交流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他们经过两年多艰苦细致的调查取证获得的大量

物证和证人证言。他们考证的严谨性、连续性，令人信服的完整证据链，真让我挑不出原则性的问题。只是那幅说是川岛芳子画的《浴嬉图》（考证人为画起的名），我提出了不同观点，指出：这幅画，来自日本100多年前的浮世绘画家落合芳幾先生画的一幅名叫《竞细腰雪柳风吕》的画，我特地又从网上调出了这幅画的图像给他们看。这样一来，使两位考证人及顾问都感到很吃惊。但冷静下来之后，我与两位考证人及顾问又取得了一致意见。方姥（川岛芳子）的画确系临摹日本画家落合芳幾的原画，但方姥的画只选择了原画的三分之一画面，而且对原画也有所改动，通过改动表达了“方姥”的内心意图。

通过这次接触和交流，我与两位考证人及顾问也成了朋友。两位考证人和顾问也为了使考证成果更充实，证据更让人信服，他们真诚地邀请我参与考证，也算是业余顾问吧！

那天我回到家以后，马上联系了我的两位学长，一位是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一位是日本《时事通讯社》的干部。《读卖新闻》的记者帮助我和李香兰联系，告诉她这件事。另一位日本《时事通讯社》的干部，他以前在美国档案馆，看到过有关川岛芳子1948年3月25日没死这种说法的文章。这是美国中央情报机关1949年左右的调查资料，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担心川岛芳子没死会给亚洲的和平和安定带来危险，就让情报机关调查川岛芳子的生死之谜。我的这位学长看了这些资料以后，一直在寻找有关川岛芳子“未死说”的证据，但始终没有找到特别有力的证据和线索。而且，他的父亲因在伪满时代的关东军会计学校学习过，因此也很关心这件事。

当我介入考证后，我又在第一时间将信息告诉了我日本的恩师中岛岭雄先生，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而且，他的故乡也是松本市。我恩师刚刚逝去的母亲如在世，大概已经100岁左右，和当年生活在松本市的川岛芳子曾一起玩过，孩童时代，她们两家住的房子又离得比较近。所以，我的老师也非常关心这件事，并支持我的研究。我的老师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作校长的时候，我是他的学生。他主编校史时，我帮助他调查资料，也了解：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就是在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东京外国语学校学的中文。很巧合，我和川岛浪速是一个母校，看来我和关于川岛芳子的研究很有缘分。我的恩师还将松本市川岛芳子纪念室的馆长穗刈甲子男的电话告诉了我，我又和这位84岁高龄的老者取得了联系。穗刈甲子男于1944至1945年间曾在长春和四平做事。回国后，他和川岛芳子的秘书小方二郎成为好友。

我介入考证近一年来，利用自己日本学者的特殊身份和有利条件，也为川岛芳子的生死之谜考证取得进展做出了点帮助。如对可能是川岛芳子遗物的“关东军文件”这一所谓物证，我因为曾研究过这方面的资料，因此判断这些关东军文件是古董贩子造假的仿制品，排除了是川岛芳子遗物的可能。

另一个特别引起我注意的东西是法国造的望远镜。玻璃镜头的铜制边缘上铸着出厂带有的很小的一行英文字“Bardou fils Paris”。在日本那个时代的望远镜,如果日本军人用的话,日本光学社和东京光学社造的多,法国造的望远镜比较少,而且法国这个牌子的望远镜也非常少,在日本或者中国的古董店买到这种望远镜的可能性非常小。我从鉴定现场李刚办公室回家后,在网上查找“Bardou fils Paris”这个牌子的望远镜,想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产地在哪。根据网上的资料显示:“Bardou fils Paris”这个牌子是法国巴黎的品牌,是一个名叫巴儿豆的先生和他的孩子1818年创立的公司品牌,1878年在国际博览会曾被授勋,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军队使用。根据以上资料来推理,在日本能够拥有这个牌子的法国高级望远镜的人只有军队的高官,一般的军人很难得到。对方姥遗物小望远镜套筒壁上的刀刻字母“HK”和“HM”,开始,考证人完全忽视了它作为证据的作用,经过我反复的研究,确认“HK”为川岛芳子曾用名金璧辉的英文叫法的缩写,并在日本也找到了川岛芳子用“HK”表示自己名字的物证,使小望远镜由一件普通的遗物,成为方姥就是川岛芳子的重要物证之一。

考证缘起的当事人张钰保留的方姥遗物——五彩玻璃坐狮,是方姥(川岛芳子)生前嘱托张钰姥爷段连祥,有机会转交给日本人小方八郎的一个“信物”。张钰也把方姥的这一遗愿当做了自己要完成的一个使命。是我从日本得到消息,小方八郎已于2000年病故,“方姥”的遗愿已无法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张钰及考证人和顾问才同意将坐狮的漆封底座打开,看坐狮“肚”里是否藏有什么“秘密”。果不其然,在2008年11月16日这天,在有新文化报刘记者和考证人、顾问及相关当事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坐狮的漆封底座被考证负责人李刚先生打开了,里面惊现曾引起公众猜解热议的“篆字幅”。使川岛芳子1948年3月25日的“未死说”又增加了更有力的证据。

就这样,我又与两位考证人结了缘,与川岛芳子生死之谜的考证结了缘。直至今日,考证的全部成果以本书的面世画上了句号。

2009年12月26日于中国长春

◎野崎晃市: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毕业,日本筑波大学博士、吉林农业大学外教。

写在前面

李刚 何景方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前清王爷（肃亲王）善著的十四格格爱新觉罗·显玕，成为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她的日本名字叫川岛芳子，中国名字叫金璧辉。

62年前的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被国民政府北平当局，以汉奸、间谍罪执行了“死刑”。但是，当年的北平市民对被枪决的“川岛芳子（金璧辉），是“正身”？还是“替身”？众说纷纭，提出了种种质疑。川岛芳子的“生死之谜”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桩悬案。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长春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会员、画家张钰向我们（李刚、何景方）透露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信息：她的姥爷段连祥，临终前（2004年）向她说出了隐瞒心底56年的秘密——张钰从小（上世纪七十年代）就熟悉，每年夏天都与其生活一段时间，并叫她方姥的老妇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这个女人并没有死在北平第一监狱，而是用“替身”换下后逃往了东北，并在段连祥等人的帮助下，隐居在长春市郊新立城的齐家村，默默无闻地生活了30年，直到1978年初才因病死去，时年72岁。

姥爷的遗言使张钰感到惊异，也给她带来了“不明真相”的苦恼，无法排解。为解开疑团、弄清真相，她全权委托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法学会理事李刚和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何景方进行考证。经过三年（2006年8月—2009年9月）艰苦细致的调查取证，终于用大量的证据，证明了段连祥遗言的真实性，并将考证的过程和结果成书出版，为争议了60余年的川岛芳子生死之谜画上了句号。

川岛芳子是在中日两国近代史上都产生过影响的人物。她的人生轨迹既连接着那个时代的血腥与罪恶，又充满了神秘和传奇。尤其是川岛芳子“生死之谜”的揭示，被中日两国新闻媒体披露后，立刻引起两国有识之士的兴趣和关注，一时间造成极大轰动。同时，由于考证的是一位神秘、传奇而又有争议的人物，也涉及历史的敏感话题，不免引起了一些猜疑。为此，我们郑重声明：我们的考证，完全是民间的、自发的个人行为，欢迎中外人士对我们的考证评头论足，提出不同观点。

也许是一种机遇和巧合吧，我们俩（李刚、何景方）都不是研究历史的，之所以承担起破